

建
安
文
子
概
論

● 王
魏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建安文学概论

王 巍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年·沈阳

辽新登字6号

建安文学概论

王巍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63,000 开本：850×1168^{1/32} 印张：10^{5/8}
印数：1—563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瑞武 沈放 责任校对：王玲
封面设计：安今生

ISBN 7-5382-1498-4/C·92

定 价：4.20 元

目 录

建安文学与建安时代·····	1
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	16
建安文学繁荣发展的原因·····	35
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	49
曹 操·····	49
曹 丕·····	55
曹 植·····	60
建安七子·····	67
蔡琰及其他作家·····	75
建安时期的诗歌·····	80
曹操的诗歌·····	80
曹丕的诗歌·····	100
曹植的诗歌·····	117
建安七子的诗歌·····	153
蔡琰及其他诗人的诗歌·····	181
建安时期的民歌·····	187
建安时期的辞赋·····	196
曹操的辞赋·····	197
曹丕的辞赋·····	198
曹植的辞赋·····	204

建安七子的辞赋·····	221
建安时期其他作家的辞赋·····	227
建安时期的散文·····	234
建安时期的小说·····	255
建安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	273
建安文学的地位和影响·····	290
建安文学研究史述略·····	304
后 记·····	332

建安文学与建安时代

建安，本是东汉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年—220年）。从政治上说，这是汉王朝岌岌可危、一统天下即将分崩离析的动乱年代，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却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起点。从此，“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始了。文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新阶段。曹氏三父子和建安七子等作家以他们辉映古今的文学成就，开创了一代崭新的文学风气，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文学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的时限要比建安年号所表示的时间更广一些，上可追溯到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的时代，下则推及魏明帝景初末年（公元240年），前后约五十余年。这是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混乱时期，正如张茂于公元235年上书所称：“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三国志》注引《魏略》）。这种“世积乱离，风衰俗乱”（《文心雕龙·时序》）的时代特征，造就了这个时期独特的文学风貌。由于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大多活动在建安年间，因而后世把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统称之为建安文学。

从地理环境看，建安文学以建安时代的北方文学为主，也就是说以曹魏文学为主，但同时也包括蜀、吴文学。如果把建安文学仅仅看成魏国文学，是不合适的。固然，在曹氏父子统治的魏国，出现了许多作家和作品，并且这些作家后来大多归附了曹操，而当时江南文风不盛，其作家作品无法和曹魏相

比。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曹魏的很多作家在没有归属曹操以前，在文坛上已经声名大振了。正如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王粲在没投靠曹操以前，就已经超群出众，写出了《七哀诗》和《登楼赋》等传世名篇。陈琳在归附曹操以前，在冀州作袁绍的记室时，文名也已出人头地，留下的一篇著名散文《为袁绍檄豫州》，是他依附袁绍时奉袁绍之命所写。为历代读者所称道的《饮马长城窟行》，也是陈琳前期的作品。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把建安文学说成就是曹魏文学。另外一个理由是尽管江南文风不盛，但还是涌现出一些作家，也流传下来一些好的作品。据《全三国文》载录，其中魏有作家一百五十多人，蜀有三十多人，吴有六十多人。当然，这些作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多少不一。蜀国的诸葛亮、秦宓、谯周，吴国的张纮、胡综、骆统、张温、薛综、韦昭等都有比较好的散文流传下来。因此，我们说建安文学是以曹魏文学为主，也包括而且必须包括蜀吴文学在内。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建安文学发展的全貌。

建安文学所以倍受人们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局面。

作家辈出，文人荟萃，这是繁荣发展局面的突出标志。这个时期的作家可以说是盛极一时，曹操、曹丕、曹植是当时文坛上的领袖，乃为后人所熟知。除此之外，重要的作家有孔融、王粲、刘楨、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即建安七子。另外，还有邯郸淳、繁钦、应璩、吴质、杜挚、左延年、缪袭、路粹、丁仪、丁翼、杨修、荀纬、祢衡、蔡琰、王朗、诸葛亮、秦宓、谯周、张纮、胡综、骆统、薛综、韦昭等等。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载有二十多位建安著名诗人的诗歌。严可均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载有

建安将近二百五十多人的散文。当然，这其中有的既是诗人，又是散文家。这是一个队伍庞大的作家群。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同时涌现了如此之多的作家，确实是“俊才云蒸”，正如钟嵘所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楨、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诗品》）。作家之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些作家，大多学识广博，才华出众。他们或长于诗赋，或工于章表，或能琴擅歌，或善于抒情，或喜好论辩，活跃在文学创作的舞台上。这些文人交往甚密，特别是邺下文人集团，他们“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这都有利于文学创作。他们在创作上还出现了竞争追逐的情状，“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曹丕《典论·论文》）。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也说：“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建安文坛的繁盛局面。建安诸子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品丰富，题材广泛，这是建安文学繁荣发展的又一标志。建安时期作家为我们创作了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虽然很多作品已亡佚，或看不到它的全貌，但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也是极为可观的。仅诗歌，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建安诗歌就有三百多首。散文，仅曹操就有三卷，曹丕四卷，曹植六卷，其他的许多作家如孔融、王粲、诸葛亮等也都有多卷散文传世。以上仅是作品的数量。题材也是极为广泛的，所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有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的，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有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的，如曹植的《送应氏》（步登北邙阪）、王粲的《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蔡琰的《悲愤诗》；有反映人民经过大

灾难后生活贫困不堪的，如曹植的《泰山梁甫行》、曹丕的《上留田行》；有反映丈夫长期在外征战或服徭役，而使家室空旷、妇女哀伤的，如曹丕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燕歌行》；有反映妇女不幸命运的，如曹植的《浮萍篇》、《弃妇诗》；有描写游子寄居他乡的哀怨的，如曹丕的《杂诗》二首、《善哉行》（上山采薇）；有描写亲友离别的哀伤，如曹植《送应氏》（清时难屡得）、《离友诗》；有对人生早逝的追悼，如孔融的《杂诗》（远送新行客）；有的反映作者的豪情壮志，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曹植的《白马篇》，王粲的《从军诗》等。还有写爱情、游览、饮宴、征战、赠答、咏史、游仙、山水等等，内容如此之丰富，在文学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为后来诗歌题材之丰富开了先河。

文体多样，五彩缤纷，这是建安文学繁荣发展的第三个标志。建安时期是文学创作的丰收季节，不仅作品空前丰富，而且文学形式之多样也是前所未有的。诗歌，这是建安时期的主要文学形式。我们知道，诗歌是中国文学最早的形式之一，经过《诗经》、《楚辞》的发展阶段，到两汉便走向衰落，两汉四百多年时间留下的文人诗歌微乎其微。而到了建安时期，诗歌创作则又出现了新的高潮，放射出瑰丽的异彩。这时四言诗虽已走向衰落，但出现了一些很有欣赏价值的篇章。五言诗是建安时期诗歌的主要形式。建安文人大量创作五言诗，出现了“五言腾踊”的局面。与此同时，六言诗、杂言诗也都有名篇佳作问世。曹丕的杂言诗《大墙上蒿行》对后代影响很大，王夫之评此诗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七言诗则以它完整的形式出现在建安诗坛上。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七言诗，向称“七言之祖”。单就诗歌的形式

看，已是蔚为大观了，而其他文体在建安艺苑中也是争妍斗奇。散文以“清峻”、“通脱”闻名于当时，称美于后世。特别是章、表、书、檄、诏、令等应用体散文得到了迅速发展。辞赋的创作在这个时期表现出新的时代特色，其发展趋势可以说与诗歌不分高下。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在先秦还只是处于胚胎时期，萌芽于两汉，而到了建安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风俗通义》、《列异传》、《笑林》等作品，为我国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这个时期也相当活跃。两汉以前，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只是零星散见于一些经、子诸书及其他论著，还没有出现过文学专论。但到了建安时期，则出现了许多文学理论文章，如曹丕的《与吴质书》、《与王朗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等。尤其是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出现，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我国第一篇文学专论，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进入了自觉的时期，也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个时期，建安诸子对各种文体都进行了大胆尝试，而且取得了显著成就。各种文体备具，皆显出巨大的生命力。这种局面，不用说建安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出现过，就是建安之后也没有再出现过。可以说，建安时期是一个百花竞放、万紫千红的艺苑之春。

旁搜博采，类萃成帙，这是建安文学繁荣发展的第四个标志。随着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逐渐积累起卷帙浩瀚的文献典籍。因而搜集、整理这些典籍，便成为当时人们的迫切需要。曹丕不仅自己积极从事著述，而且还重视整理编辑文献，组织当代的文学之士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缪袭等人，“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三国志·文帝纪》）。此书“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三国志》注引《魏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

大型类书，“类书之事，始于《皇览》”（《玉海》），故被称之为类书之祖。另外，曹丕还注重搜集已故建安诸子的遗文，为保存这个时期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做出了贡献。

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地位。因此，研究建安文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通过对建安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它的发展过程，揭示它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时代文学的繁荣和昌盛，都是受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影响、所决定的，考察某一时代的文学发展的原因，不能不考察其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建安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

一、东汉末年尖锐的社会矛盾

东汉王朝从光武帝时起，到和帝时期为止，已走过了它的强盛时期。和帝以后，东汉政权日趋腐败，政治极端黑暗，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他们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外戚和宦官的擅政，是专制政权形式下的必然产物。

东汉末年的外戚，都是出身于开国时的将相功勋之后。他们在皇帝或太后去世之后仍掌握朝廷的政权。如和帝即位以后，窦太后临朝听政，而其兄窦宪为大将军“威震朝廷”；安帝即位时，邓太后临朝，后兄邓骘秉政；顺帝即位后，梁氏掌政，后父梁商、兄梁冀为大将军，仅梁冀就掌政达二十四年之久。据史书记载，梁氏一门出了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將軍，卿相尹相达五十七人之多。顺帝以后的冲、质、桓三位皇帝，都是梁冀所立。年幼的质帝只因说了他一句“跋扈將軍”，就被毒死。朝中的大小政事都由他独裁，皇帝根本无权

过问，专权达到了极点。

外戚专权，无视幼主，待皇帝年长以后，为了摆脱外戚势力的威胁，往往结纳自己左右的宦官，以图除掉外戚。这样，皇帝亲政，重用宦官，于是又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如和帝用宦官郑众谋除外戚窦宪；安帝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外戚阎显，拥立顺帝被封为侯，宦官权势渐盛；到了桓帝时，其依靠宦官单超、左悺、具瑗、徐横、唐衡等五人，铲除梁冀一门。成功之后，同日封侯，被称为“五侯”。

宦官执政之后，同样骄横跋扈。单超死后，其余四侯专暴更甚，民间说他们是：“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后汉书·董超传》），可见其跋扈之甚。

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使东汉末年的政权日渐腐朽、黑暗，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他们都是贪赃枉法，大量掠夺人民的财产，搜括民脂民膏。如外戚梁冀秉政期间，搜刮四方货财，“充积藏室”，掠夺百姓做奴婢称为“自卖人”达数千人之多。为了狩猎取乐，他“多拓林苑，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殆将千里”（《后汉书·梁统列传》），作为他的园苑；甚至四方向皇帝贡纳的礼品，都要先入梁府。梁冀被诛后，抄没他的家财，值钱达三十余亿，竟是东汉全盛时期全年租税的一半，这些自然都是从百姓中掠夺来的。

宦官的横行暴敛，比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宦官侯览，“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后汉书·侯览传》），其住宅还模仿皇宫的样式，建有楼阁、池塘、苑囿等，甚是豪华。其兄侯参，掠夺百姓的财物，达几十万，金银锦帛达三百余车，足见其敲诈勒索之甚。

另外，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上两极分化极为严重。高官显贵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生活资料，穷奢极欲，而广大百姓

却饥不果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安帝以后，旱灾、水灾、虫灾不断发生，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仅安帝在位的十九年间，水灾达十一次、旱灾七次、虫灾五次，受灾面积最广大四十一个郡国。农田荒芜，粮食缺乏，造成饥民流亡，“时州郡大饥，……老弱相弃道路”（《后汉书·安帝纪》）。“永兴元年，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乞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后汉书·桓帝纪》）。尽管这样，农民所受到的剥削、压榨却没有减轻，豪强地主的积蓄日渐增长，“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集，船车贾贩，周于四方”。这样，使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更加尖锐。

再有，在宦官、外戚的斗争中，由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也在起作用。宦官专权，使朝中的官僚遭到排挤和压抑，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由于察举制度败坏，贿赂公行，官僚机构更加滥杂。当时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歌谣深刻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察举的虚伪。一些在太学中读书的太学生，因宦官把持大权，难以出任，引起他们的不满。这样，他们就和遭到排挤的官僚们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宦官的斗争，最后终于发生了东汉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党锢事件以后，东汉王朝的政治腐败到了极点，卖官鬻爵，贿赂成风，上下沆瀣一气。灵帝公开在西园卖官自肥，“二千石的官卖二千万，四百石的官卖四百万”，公、卿、州郡长官、关内侯，直到警卫军士、羽林、虎贲等都标有定价。有些官爵，不敢公开买卖，就通过宦官及皇帝的亲信私下进行交易。这样，官吏到职后，便极力搜刮民脂民膏，把买官的钱捞回来。农民被剥削和被压榨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

在当时社会的诸种矛盾中，民族间的矛盾也很尖锐复杂。东汉统治者不仅剥削、压榨内地汉族百姓，同样，对从边境迁

到内地的少数民族也进行残酷的掠夺，最先起来反抗和斗争的是西羌人。

西羌人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反抗东汉统治者的斗争。第一次大暴动发生在公元107年夏。东汉骑都尉王弘强迫金城（甘肃兰州）、陇西（甘肃中部）、汉阳（甘肃伏羌县南）羌人远征西域，羌人因怕远戍不归，行至酒泉（甘肃酒泉）时，遂散逃反抗，遭到郡县发兵邀截，并被捣毁住宅，强令西征。羌人被迫发生暴动。这次暴动，持续了十二年之久，最后虽然被镇压下去，但东汉王朝所耗费的战费达二十四亿钱之多，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

第二次羌人大暴动发生在公元140年。顺帝永和四年（139年），东汉王朝以来机、刘秉为并州、凉州刺史，对羌人进行更为残暴的奴役和掠夺，激起了羌人更大规模的反抗。第二年，起义的羌人先后攻打金城、关中、武都、陇西等，杀朝廷命官，焚烧先帝陵园等，声势很大，使东汉官兵屡遭失败。第二次羌人大暴动持续了五年。

在东汉王朝对羌族长达五六十年战争期间，共耗费军费约四百亿钱，严重地摧毁了东汉王朝的财政。同时，由于连年战争，使大量士兵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歌谣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后汉书·五行志》）足见其长期战争对农村经济破坏程度之严重。

宦官、外戚的斗争和党锢事件，使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加尖锐，广大农民的流亡和负担的加重，进一步激化了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迫使农民不断的起义，反对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远在安帝、顺帝时，农民大小起义就接连不断。仅桓帝统治的二十一年中，农民起义就发生了十四次。

灵帝在位的十二年中，农民起义发生了六次。最后，到了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以张角为首的波澜壮阔的黄巾大起义。

起义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迅速扩大了队伍，所到之处，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攻打豪强坞堡，没收地主大批财物，以摧枯拉朽之势，给东汉王朝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黄巾军主力经过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最后终于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和农民军本身的弱点及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失败了。但是，农民起义的火焰却是扑不灭的。各地的黄巾军和继起的太行山黑山军仍坚持斗争了十几年，向东汉统治者展开了一场规模壮大的持久战，彻底地动摇了腐败透顶的东汉王朝的统治。

黄巾起义所产生的巨大威力，为后来比较开明的政治局面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二、军阀割据下的动乱社会

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豪强地主势力不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在农民起义时期内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纷纷起兵，逐渐形成割据一方的局面，最后终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

最初，是以掌握朝廷大权的董卓和以袁绍为盟主的军阀之间的相互混战。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朝廷统治大权被何太后及后兄大将军何进所把持。何进为了铲除宦官的势力，联络袁绍密召驻防河东的并州牧董卓入京，企图诛杀宦官，因事泄反而被宦官所杀。接着，袁绍入宫把宦官一网打尽。董卓乘机带兵进入洛阳，另立灵帝少子

刘协为帝（献帝），并逼走袁绍、曹操等人。董卓当权，专横跋扈，法令苛酷，其部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关东各州郡牧守不满董卓专权，以袁绍为盟主，纷纷举兵讨伐董卓，混战的帷幕拉开了。

董卓为了躲避关东军的进攻，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并驱使洛阳一带百姓西行。西行前，他大肆烧掠，使洛阳周围数百里内的房屋荡尽，一空如洗，其惨状目不忍睹。

董卓被杀后，继而又展开了袁绍集团和曹操集团之间的混战。袁绍“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是东汉后期很大的一家豪族。董卓西逃后，袁绍打败占据幽州（河北北部）的公孙瓒，占据了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地区实力最强的割据势力。

曹操是北方地区另一个割据势力。他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收编了三十万青州黄巾军的精锐队伍以后，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他迎汉献帝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越地位，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同时，他又采取了一些积极开明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措施，在许县和其他地方设立屯田，积蓄了军资，成为足可以和袁绍抗衡的唯一力量。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曹两军发生了官渡之战。曹操利用袁军的弱点，乘其不备，采用各个击破和偷袭粮屯的战术，打败了袁军，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官渡战后，袁绍在忧郁中病死，其子袁谭、袁尚互争权位，相互攻击。曹操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相继占领了青、冀、幽、并四州，统一了中原。以后，他又出兵打败了与袁氏残余势力勾结的乌桓，为最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挥师南下，企图夺取刘表割据的荆州（湖北襄阳），然后再进占江东，达到逐步实现

统一全国的目的。但是，赤壁一战，曹军大败。曹操不得不退回北方。从此，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基本确定，不久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阀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整个北方地区呈现出“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的荒凉、凄惨的景象。据史料记载，仅董卓强迫几十万人口西迁长安，把洛阳宫庙、官府、民宅全部烧毁，使昔日繁华的洛阳，顷刻变成了“二百里内无复孑遗”的空荒区域。途中“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后汉书·董卓传》），其惨状目不忍睹。关中凉州军阀混战，长安几十万人口走死逃亡，“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后汉书·董卓传》）。曹操与徐州牧陶谦战，操军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曹操“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三国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

军阀混战，必然造成土地的荒芜和饥馑的流行，当时甚至连割据者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食。“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羸。”（《三国志·武帝纪》）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曹操部队的军粮里也杂有人脯，以补粮食之不足。军队尚且如此，那末平民百姓之饥馑情形便可想而知了。

三、三国鼎立后社会的相对安定

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以后，统治者都想方设法安定其统治地区的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以确保自己的统治。